

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

梁 晨 任韵竹 王雨前 李中清

摘 要：作为中国近代化最重要的窗口，民国上海不仅具有商业经济和多元文化，其高校数量亦居全国各省市之首。这些高校培养出的众多学生，不仅构成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基础，其群体特征对理解民国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亦至为关键。基于大学生学籍数据的量化分析发现，若以“从什么地方来”、“从什么家庭来”和“从什么系统来”三个角度衡量，这一群体的家庭背景较为同质化，地理来源比较集中。理论上面向全国和全社会开放的各类公私立大学，学生主要来自于具有文化或财富优势的本地家庭和与各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本地中学。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高等教育的实况。

关键词：社会来源 教育获得 大学生

作为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和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既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港口和经济中心，也是“西学东渐”的入口和近代文化教育之重镇。^① 民国上海地区高校不仅数量一直居于全国各省市之首，且类型丰富，公私立大学、综合与专业院校并举，学科门类齐全。^② 1933年，全国有立案大学63所（不含专科），上海以14所居第一，作为全国文教中心的北平以12所居次席。^③ 1948年，上海专科以上学校有30所，北平仍为12所，首都南京只有9所。^④ 时人谓之“全国大学之分配，独厚于上海”。^⑤ 上海高校学科与课程设置强调趋新和实用，偏重商科、国际贸易、市政、法律、新闻、药科等专业，对高深基础科学和综合人文研究较轻视，学术地位和

* 本文为“第三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参会文章。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5BZS073）、香港科研资助局GRF项目（640613）资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① 作为行政区划和地理空间的上海，自晚清开埠后，变化频仍。本文所指“民国上海”大体以上海特别市（1927年成立）1928年时的区域范围为界，具体区划范围参照1928年上海特别市政区图。参见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② 许敏：《上海通史》第10卷《民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1—142页。

③ 中国学生社编：《全国大学图鉴》，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第16—18页。

④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5编《高等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578—587页。

⑤ 程其保：《对于恢复与整理上海各大学之商榷》，《时代公论》1932年第4期，第19—22页。

社会声誉似不如北京，^①这对民国学生的大学择校亦有影响。

分析大学生源构成是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与阶层流动的关键之一。1905年，科举停废后，学堂（学校）体系逐渐取代官学书院系统，成为中国社会精英生长和社会流动的主渠道。1920年以后，大学生成为民国社会的知识精英与诸多职业的领军者，^②大学逐渐“占据了社会流动的关口”。^③从官学书院到近代学校的转变是系统而复杂的，不仅教育的内容和人才评判的标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才考核与选拔的组织方式乃至学校的分布等都有重要改变。如清代通过对书院官学化的改造，^④在实现寄学校之意于书院的同时，分布也颇广泛。“十八行省中，其布政司之所治者，必有数大书院，若府治、若县治，莫不有之，即村镇稍大者，亦往往有焉。”^⑤但民国各级学校的地理分布很不均衡，不仅学校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地区，即便是沿海、沿江地区内部，大、中学校也主要聚集于少数大城市，乡村甚至小城市却很匮乏。^⑥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转变对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教育机会的区域平等乃至社会流动都有影响，借助一定规模的量化分析，可以对这些转变造成的影响形成较准确的系统性认识与判断。

民国上海8所大学的学籍卡资料给量化分析提供了可能。学籍卡并非罕见的历史材料，但单张学籍卡并不能为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据，唯有系统地建立数据库，进行量化分析，才有可能探寻出传统史料中无法直接获得的史实。^⑦自2010年起，笔者将上海市档案馆藏7所民国大学学籍资料和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该校民国学籍资料系统地输入电脑，构建成量化数据库。以1948年上海情况看，8所大学占据了4所国立大学中的2所（上海交通大学和暨南大学，缺同济大学与复旦大学）、4所教会大学中的3所（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法学院，缺震旦大学）、3所私立大学中的1所（大同大学，缺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⑧）、2所国立独立学院中的

- ① 许敏：《上海通史》第10卷《民国文化》，第142页。尽管上海高校的学术旨趣和研究侧重与北京高校不尽相同，但每当北京政局或学界变动时，又往往有北京教授南移上海。如1912年任教于清华的胡敦复、严海澜、朱晚香等人南下上海兴办大同大学。19世纪20年代后，陈独秀、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和胡适等也曾纷纷南来上海。
- ② 通过对民国清华大学从业群体社会背景的分析发现，教育对社会分层起到了关键作用。参见梁晨：《民国大学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流动研究——以清华大学为例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 ③ 叶赋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1840—1922》，王晨、张斌贤编：《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页。
- ④ 李世愉认为清代的书院虽未正式纳入官学体系，但实已官学化。许多针对书院的政策、措施已正式纳入礼部条例，没有政府干预、控制或监管的书院几乎是不存在的。参见李世愉：《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1年第9卷第3期。
- ⑤ 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林载爵编：《严复文集编年（一）》，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162页。分析李国钧等编《中国书院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083—1196页）中整理出的清代约4000所书院的地理分布，亦可印证严复之判断。
- ⑥ 彭武：《复兴中国的自学制度概要》，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对教育工作的建议》，编号：五一—28（1），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⑦ 有关学籍卡特点、利用方法、困难与价值，参见梁晨、李中清：《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以学籍卡材料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为中心的讨论》，《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 ⑧ 民国上海私立高校学科侧重或状况多有不同，如大同大学重理科，复旦大学重商科，大夏大学教学更优，光华大学以法科见长等。（程其保：《对于恢复与整理上海各大学之商榷》，《时代公论》1932年第4期，第19—22页）这些因素都会对生源结构有影响，因此只能以大同大学推论而不能代替全体私立大学。不过19世纪40年代，大同大学一度是上海各大学学生人数最多的（参见《全国各大学的介绍及最近五年各校入学试题》，1945年，第10页），因此通过大同大学了解民国私立大学的情况，也是非常重要的。

1所（上海商学院，缺国立上海医学院）以及17所专科学校中的1所（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这不仅涵盖了国立、教会和私立三类学校，且11所大学中的6所所有数据，比重超过一半，学生总数达3.6万多人，应能较好反映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政府建立后上海主要高校的学生来源情况。从量化分析的角度看，与抽样调查数据相比，档案数据更具客观性，即使数据库并未包括民国上海地区所有大学，在代表性方面，仍然优于抽样数据，能够更好地还原史实。

表1 民国上海8校大学生学籍卡数据情况

学校	类型	建校时间/ 大学成立时间	入学年份	主要变量信息	样本量
上海交通大学	国立	1896/1921	1913—1949	个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现住址、通讯处、毕业高中等；家长：姓名、关系、职业、住址等；社会：保证人姓名、职业、住址与关系等。	9932
暨南大学	国立	1906/1927	1933、1937、 1940—1949		1443
上海商学院	国立	1917/1932	1921—1945		1691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	市立	1945	1945—1956		901
圣约翰大学	教会	1879/1905	1919—1952		5325
东吴大学法学院	教会	1896/1900	1918—1952		5105
沪江大学	教会	1906/1915	1936—1952		2754
大同大学	私立	1911/1922	1930—1952		9050
上海八校					36201

注：民国上海8校建校与大学成立时间主要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辑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整理。其中，1915年，改浸会大学为沪江大学；1921年，南洋大学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合组为国立交通大学；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与暨南学校合办的商科大学在上海创立；1922年，暨南学校退出商科大学，改名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1927年，国立东南大学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商科大学改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1928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又先后改名为江苏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1932年独立建制，改名国立上海商学院。

上海8校大学生学籍卡的数量、连贯性和具体内容差别较大（见表1）。总的来说，学籍卡多集中于19世纪20年代后期，尤其是30年代和40年代。这一方面是由于早期材料散佚较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包括上海在内，民国各地大学数量和学生规模的扩展主要开始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各校学籍卡包括三方面信息：家庭状况（家长职业、家庭地址、成员数量等）、求学履历（入学前教育情况）和个人情况（性别、籍贯、民族和专业等）。家长职业、家庭地址和来源中学等为判断民国上海大学生“从什么家庭来”、“从什么地区来”和“从什么系统来”提供了重要证据，是衡量大学生家庭阶层、地区来源和入学途径的重要指标。本文将围绕这三类数据的统计结果，讨论民国上海大学生社会来源的状况以及教育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社会流动等问题。

一、家长职业的同质化

学籍卡中家长职业的填写与当时职业调查类似，很多只有“只言片字”，能够判断职业的行业属性，但无法直接断定阶层属性。如民国职业调查中“农”通常既包含地主也包含贫雇农，“工”既包括工厂主也包括工人等。^①学籍卡中最突出的是大量家长职业为“商”，因缺少具体职务等信息，仅凭一个字，研究者无法确认其是大商人、高级经理人还是最基层的商业劳动者，

^① 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

也就无法判断家长的阶层属性。因此，本文在统计家长职业信息的同时，还将结合民国大学教育成本等相关因素来尝试判断学生家长的阶层状况。

对照今日职业分类标准，表 2 统计了上海 8 校大学生家长的职业构成。其中，商人高居第一位，专业技术人员居第二位。这两种职业群体比重之和，除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外，其他 7 所大学都超过了一半，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更接近九成；暨南大学相对较低，可能与其招生主要面向华侨以及抗战期间曾迁往福建有关；其他高校基本或主体未离开上海，不管是国立上海交通大学，还是教会圣约翰大学、私立大同大学等，学生家长职业构成均偏向于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这两类职业群体，这与民国上海丰富的职业构成形成了反差。^①

表 2 上海 8 校大学生家长主要职业构成比 (单位:%)

学校	农民	办事人员	商人	军人	官员	专业技术人员	工人	其他	总计	样本量	有效样本量
大同大学	1.38	8.1	38.72	0.42	6.92	36.76	0.54	7.16	100	9050	8472
圣约翰大学	0.48	1.04	59.74	0.3	6.48	25.06	0.37	6.53	100	5325	4613
沪江大学	0.5	0.5	68.44	0.36	8.03	18.62	0.72	2.75	100	2754	2218
暨南大学	17.06	1.15	34.49	2.16	11.95	23.11	0.72	9.36	100	1443	1389
东吴法学院	1.85	0.9	57.54	1.16	12.02	20.63	0.47	5.43	100	5105	2322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	10.22	12.81	22.8	0.47	5.52	22.56	4.58	21.03	100	901	851
上海商学院	4.94	0.09	48.05	0.78	18.18	26.93	0.52	0.52	100	1691	1155
上海交通大学	10	0.56	40.96	2.13	14.08	25.29	2.71	4.28	100	9932	5022
上海八校	5.80	3.14	46.34	0.97	10.40	24.87	1.33	7.13	100	36201	26042

注：其他包括赋闲、无业和未知。有效样本包括所有填写家长职业信息的学生总量，已填写但未能确定分类的则归为其他类。

从动态角度看，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优势是持续的。圣约翰大学自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商人家长比例一直最高，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家长比例之和更高达 80% 到 90% 多。大同大学两类职业家长比例之和一直在 75% 到 80% 多之间，1947—1949 年间，专业技术人员家长群体比例超过了商人。上海交通大学商人家长也一直是最有优势的群体，两种职业身份相加，多数年份在 70% 左右。不过抗战胜利后的 1946 和 1947 两年，两种职业的家长比例一度下降到不足 60%，而以“农”为业的学生家长从 5% 左右增加到 16% 左右。通过家庭住址分析，这或与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上海，江浙地区学生进入上海高校有关。

作为上海中上阶层的主体，^② 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优势当与高等教育的高成本有关。民国大学生的花费包括学费、住宿费、膳食费、图书费、服装费以及交通、娱乐、卫生杂费等多种。由于地区、学校与学生个人之间的差异很大，准确厘清大学生花费或教育成本并不容易。但若以 19 世纪 20 年代末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主要城市大学生

① 开埠以来，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和工商业发展，上海的社会职业类型非常丰富，仅华界就出现了“农、工、商、学、党、政、军、交通、新闻记者、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士、士兵、警察、劳工、家庭服务、学徒、佣工和杂业”等 20 多种职业。参见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复旦学报》1985 年第 4 期。

②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26—37 页。

年花费的调查为依据，结合全国高校主要集中于这几个城市的现实并参照相关研究，^①大致可以确定当时全国大学生的年均花费在 300 元左右，而上海可能更高，在 500 元左右（表 3）。

表 3 民国主要都市大学生年均花费调查

地区	大学生年均花费
北平	1929 年调查：师范类大学学生年均花费 200 元，一般公私立大学 300 元，教会燕京大学较节约的花费为 320 元
天津	1929 年调查：南开大学学生年均花费 300 元
上海	1929 年调查：综合学杂费、膳费、服装费、住宿费、书籍费、交通、娱乐费等，上海大学生年均花费为 500 元 1930 年研究：上海大学生每年花费至少 500 元（未提供任何证据或推算依据） 1934 年调查：沪江大学校方认为学生年花费最低 380 元，中等 580 元，最高 780 元；沪江大学生顾宗沂认为平均花费 500 元 1935 年调查：圣约翰大学校方估算年均花费 600 美元，学生估算 750 美元（按：以 1936 年官方汇率计，一年花费超过 2000 元，为各地所见数字中最高）
南京	1929 年调查：中央大学学生年均花费多数为 300—350 元，年平均为 426.12 元
广州	1929 年调查：中山大学学生平均年花费为 220 元
全国	1934 年调查：学生个人年均花费最低个案出现于内地大学，100 元左右，最高个案出现在以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为代表的上海教会大学中，达 1200 元，全国平均为 340 元

数据来源：北平与天津大学生年均花费，参见新晨报丛书处：《北平各大学的状况》，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卷》（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65—648 页。上海大学生年均花费，分别参见屠铁珊：《一张上海大学生的用费单》，《中国学生》1929 年第 11 期，第 24—25 页；周容：《中国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华教育界》第 18 卷第 12 期，1930 年，第 1—11 页；《沪江大学城中区商学院院况剪报（史料）》，编号：Q242—1—309，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国学生社编：《全国大学图鉴》，第 180 页；徐以骅、韩信昌：《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68—69 页。南京大学生年均花费，参见刘渠：《大学生用款分配及其背景之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文教事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720—733 页。广州大学生年均花费，参见古棣：《中山大学暨附校学生用费的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卷》（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959—1021 页。全国大学生年均花费，参见何清儒：《大学毕业生的报酬》，《教育与职业》1934 年第 158 期，第 507—509 页。

不论大学生年均花费是 300 元还是 500 元，显然“大学教育是需要经济的”，^②不仅上海的一般产业工人家庭无法承受，即便是小康之家，培养出一名大学生也非常吃力。1928—1929 年间的一项调查表明，上海五口之家全年需要 415.35—498.42 元的收入才能维持生活。当时上海 30 个行业的男工平均实际年收入约为 255.96 元，夫妻同时工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③上海调查货价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对 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10 月 230 户上海工人家庭账簿的调查发现，仅有 27 户工人家庭有教育费用的支出，平均每家仅有 7 角 7 分的年教育支出，^④这与大学

① 叶文心认为 20 世纪 20 年代全国大学生年开支在 220—400 元不等，但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一数字应会稳步上升。参见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冯夏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3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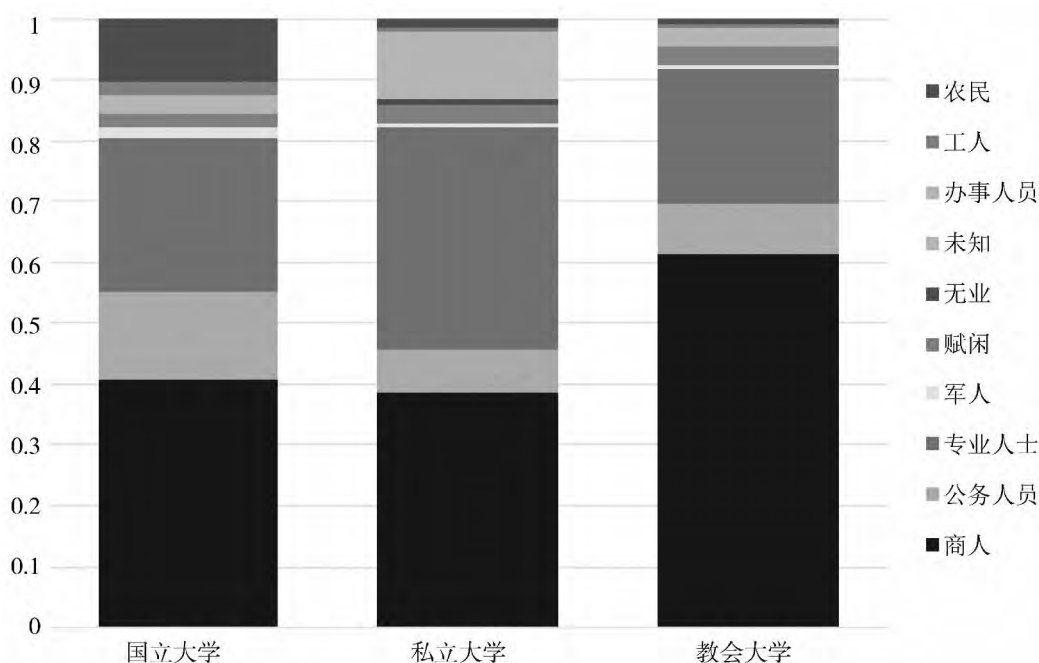
② 何清儒：《大学毕业生的报酬》，《教育与职业》1934 年第 158 期，第 507—509 页。

③ 丁同力、周世述：《上海工厂工人之生活程度》，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233—242 页。

④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城市（劳工）生活卷》（上），第 243—336 页。

所需费用相去甚远。如果加上中小学教育投入，培养大学生的成本还要增加很多。古棣 1929 年通过对中山大学学生人均年花费的调查研究，推算认为当时培养出一名大学生，家庭需要支出的费用约 5000 元之巨。^① 有研究认为，1935 年，中原地区有 200 亩土地的家庭仅能承担一个子女每年 150 元的中学花费。^② 照此推算，有四五百亩田地的家庭才能承担一个子女的全国平均大学教育费用，而上海的大学教育费用还要更高。高额的经济成本成为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的一道隐形门槛，把缺少足够经济条件支持的家庭子弟排挤在外。

不同性质高校的学生家长职业构成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差别（见下图）。教会大学中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国立大学的家长职业构成最为丰富和多样。上海交通大学和暨南大学，农民子女的比例都达到了两位数，远高于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



上海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家长职业结构图

注：国立大学包括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商学院；私立大学为大同大学；教会大学包括东吴法学院、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国立大学学生总数为 13066 人，私立大学为 9050 人，教会大学为 13184 人。国立大学学生填写家长职业人数为 7566 人，私立大学 8472 人，教会大学 9153 人。

这一方面是因为国立大学学生的地理来源范围更广泛，外地学生家长中从事农业的比例较上海高；另一方面也与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收费高昂以及教会大学校风“洋化”，对学生英语能力要求高等，以至于对社会中下层和广大乡村多有疏远有关。国立大学经费以国省库款为大宗，对学费的依赖较低，而教会大学与私立大学除捐款外，学费是非常重要的大宗经

① 古棣：《中山大学暨附校学生用费的调查》，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文教事业卷》（三），第 959—1021 页。

② Y.C. Wang, “Western Impact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 125, no. 6, 1960, pp. 843-855.

费来源,^①因此,教会大学与私立大学往往会收取高于国立大学很多的学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如抗战全面爆发前,国立交通大学与同济大学每年学费分别为40元与50元,而私立复旦大学和大同大学分别为100元和120元,教会沪江大学、震旦大学、东吴法学院及圣约翰大学则需要100元、120元、140元甚至150元,每年仅学费一项就相差50—110元之多,^②这使得教会大学与私立大学的经济门槛高于国立大学。尽管高学费的收取或许是出于维持学校运营的不得已之举,但其结果都使得学生的社会来源偏向于商人与专业技术职业群体子女等社会中上层。

教会大学不仅收费高,外语氛围也更浓厚。圣约翰大学曾是教会学校中唯一全面贯彻英文教学的。^③沪江大学最初只开设英文专业课程,其他专业课程使用中文教授,但学生们“对学语言比对学科本身更感兴趣”,学校最终只得采用圣约翰大学的做法,除了国文课外,其他课程全部使用英文。^④对英文的重视固然有其功利目的,英语是国际化商业氛围中最重要的技能之一,是在上海谋取体面和高薪工作的保证,如英语水平出众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向来为上海海关、邮政及其他收入颇高的工商界机构所欢迎;^⑤但相对于其他科目,长期的英语培养和学习显然对家庭的经济能力、文化氛围等有着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可能更受商人家庭欢迎。

上海地区高校学生家长职业的构成也颇具地域特色,与其他地区高校不尽相同。以国立大学为例,比较上海交通大学与“民国大学生数据库”^⑥中已完成的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尽管三所大学均是当时的著名国立大学(其他还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在办学层次上较为接近,但由于各自办学风格的差异以及受上海、北京与广州这三座近代中国最为重要但显著不同的城市之影响,三校学生家长的职业构成有相似更有差异。首先,三校的学生家长职业结构有类似性,即商人、技术人员和官员等三类社会优势群体最为显著。城市职业人口中占有重要比例的工人和在全国职业人口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农民,其子女在三所国立大学中的比例都较低。其次,尽管总体结构类似,但上海三大优势职业群体的比重更高,接近80%,中山大学约为70%,清华大学不到60%。同时清华大学工、农学生的比重略高于20%,是三所大学中最高的。实际上,三所大学官员或公务员子女的比例都在10%略多,比较接近,差别主要集中在商人和技术人员,这或可看作是民国上海商业化和近代化领先全国的一种表现。此外,上海产业工人尽管数量居全国之首,但其子女即便在上海国立高校的比例也很低,甚至低于并不以工商业发达著称的北平。

① 中国学生社1933年对全国63所公私立(私立含教会)大学和学院的调查发现,公立大学的经费以国省库款为主,占有收入的92.8%,学生学费只占4.3%。因此可以减少学费。而私立大学最大宗的收入来自捐款,占全部收入的54.4%,此数抵不上国省库款,所以取于学生本身者,不得不较重于公立学校,约占全部收入的24.5%。参见中国学生社编:《全国大学图鉴》,第8页。

② 相关数据分别参见:《交通大学一览》,1936年,第15页;国立同济大学出版课编:《国立同济大学概览》,1934年,第4页;“学校介绍”,《滇声》1934年第1期,第179—180、185—186页;《私立沪江大学学则一览》,1934年,第41页;《私立震旦大学一览》,1935年,第17页;《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一览》,1936年,第25页;《圣约翰大学一览》,1937年,第40页。

③ 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④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6—57页。

⑤ 1895—1920年,圣约翰大学共毕业大学生420名,其中16人任牧师,76人任教师,9人为医生,11人为官员,283人在工商界工作,其余25人出国留学。(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⑥ 自2010年起,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撑下,梁晨领导了这一旨在将全国主要地方档案馆中所藏民国大学生学籍卡资料输入电脑,构建量化数据库的项目。项目目前已经初步完成,输入学生量超过10万人。

二、家庭地理来源的本地化

学籍卡中通常同时含有两类信息能指示学生的地理来源：籍贯与家庭地址（也有一些是永久通信处）。囿于复杂数据处理的困难，多数研究以籍贯来理解群体的地理来源，但众所周知，籍贯往往不能准确反映个人真实的生长环境。以上海为例，作为近代中国最典型的移民城市，约85%的人口由外地迁入。上海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和南方的福建、广东是输送移民人口较多的省份，还有40个国家的外侨生活于此。^①这一庞大人口在清末民国时期集中移入，他们的子女可能一直生活于上海，但籍贯却是外地。如果将他们与真正从外地考入上海求学的学生混为一谈，对正确判断上海高校的开放性和社会流动等都会产生误导。

籍贯与家庭地址的统计结果证实了这种担忧。以籍贯衡量，民国上海大学生主要来自以江浙为中心的东部沿海省区；但若以家庭地址来衡量，绝大部分学生来自上海本地。以材料规模较大、时间连续性较好的教会圣约翰大学、私立大同大学和国立上海交通大学三所大学为例（表4），三校学生籍贯以江苏、浙江两省为多，上海本地并不显著。若以家庭地址来衡量，三所大学的上海学生比重几乎都呈现出10倍左右的增长。大同大学从8.7%增加到86%，圣约翰大学从5.5%增加到52.1%，上海交通大学从3.22%增加到40%。

表4 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籍贯与家庭地址地理分布^②（单位：%）

地区	大同大学		圣约翰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籍贯	家庭地址	籍贯	家庭地址	籍贯	家庭地址
上海	8.72	86.1	5.45	52.18	3.18	40.06
江苏	42.87	7.2	31.62	12.07	41.23	25.79
浙江	32.4	1.76	29.47	5.07	22.59	9.01
安徽	2.8	0.35	3.83	0.93	4.6	2.14
福建	2.42	0.39	6.46	4.58	3.27	1.59
广东	5.6	0.14	16.26	2.75	5.92	2
江西	0.96	0.4	1.07	4.65	2.46	1.51
湖北	0.75	0.26	1.34	1.82	2.52	2.17
山东	0.76	0.5	1.27	1.45	1.47	1.68
四川	0.28	0.48	0.39	3.8	3.69	4.16
北平	0.19	0.22	0.1	2.79	0.31	1.38
港澳	0	0.67	0	2.15	0	0.7
天津	0.13	0.23	0.1	1.64	0.08	0.76
其他	2.12	1.3	2.64	4.12	8.68	7.05

注：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中，大同大学学生共9050名，其中9041名有籍贯记录，7718名有家庭地址记录；圣约翰大学学生共5325名，其中5137名有籍贯记录，4086名有家庭地址记录；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共9932名，其中8051名有籍贯记录，7101名有家庭地址记录。

① 熊月之：《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总序”，第3、5页。

② 1940年至1945年间，上海交通大学实际上有上海和重庆两个校区，但重庆校区学生数量一直较少，即便是1942年成为总校以后，尽管规模有所扩大，但学生数量仍旧低于上海校区。从目前存留的学籍卡数量看，1944、1945年，重庆只有数份；1940—1943年，数量及占比分别为55（16.19%）、44（12.5%）、108（30.68%）和128（36.36%）份，仅有1942和1943两年较多。考虑到重庆和上海情况差别很大以及本文分析的主题，此处不包含上海交通大学重庆校区学生数据。

从动态角度看,上海大学生源以江浙沪为主的地区性特点一直存在且较稳定。三地生源中,大同大学一般占九成左右,上海交通大学在七成以上,圣约翰大学在六成左右波动,具有明显优势。抗战全面爆发后,各高校江浙沪生源比例有了一定下降,这可能与其他地区人口涌进上海尤其是租界有关,但这种下降程度有限,并没有影响到江浙沪生源的优势地位。而从1944年开始,这一下降趋势停止,江浙沪生源比例又逐步升高。

从比较角度看,上海地区高校学生地理来源也较集中(表5)。如作为上海高校中学生地理来源最广泛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多集中于上海及附近江浙地区,中山大学基本以广东为生源基地,但清华大学学生来源全国化趋势明显,江苏、平津、浙江、山东以及湖南、四川等地区比例都较高。叶文心曾指出,民国高校由于质量和名望差异明显,形成了全国性、地区性和纯粹省级高校的状况。^①据此推测,民国高校中可能只有清华大学以及暂缺数据的北京大学等具有广泛的全国性影响,其他高校主要是区域性或本地化的。就上海而言,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沪上名校基本是地区性的高校,大同大学等私立大学则是本地性的高校。

表5 抗战全面爆发前国立三校大学生家庭地理分布

(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中山大学		清华大学	
江苏	33.29	广东	76.48	北平	20.17
上海	30.34	广西	9.29	江苏	10.36
浙江	12.77	港澳	3.03	浙江	6.74
南京	2.6	南洋	2.23	天津	6.36
江西	2.48	湖南	1.42	山东	5.99
北平	2.31	江西	1.01	河北	5.82
安徽	2.01	江苏	0.87	上海	5.28
湖南	1.89	福建	0.81	湖南	4.16
福建	1.6	四川	0.59	辽宁	4.08
四川	1.36	河南	0.56	广东	3.62
广东	2.42	浙江	0.55	河南	3.2
广西	1.06	上海	0.3	南京	3.04
港澳	0.95	湖北	0.28	四川	2.75
山东	0.83	安徽	0.25	湖北	2.2
天津	0.71	南京	0.19	安徽	2.16
汉口	0.59	北平	0.13	江西	1.71
河南	0.47	山东	0.07	福建	1.66
湖北	0.41	汉口	0.07	汉口	1.12
南洋	0.3	河北	0.04	南洋	1
河北	0.24	辽宁	0.04	广西	0.71
其他	1.37	其他	1.79	其他	7.87

注:表中城市为院辖市,海外学生主要分为港澳与南洋两大类,其他比例很低的地区合并为“其他”类。

首先,上海地区高校学生主要来自于本地和周边地区,这可能与民国时期大学招生通常是由学校而非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安排有关。^②与国家统一招生考试相比,学校组织招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点设置有限,通常只限于学校驻地或极有限的少数大城市。如作为国立大学的上

① 叶文心:《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导言”,第3页。

② 如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只规定大学招生对象须有立案中学毕业证书,但对具体的组

上海交通大学，1922年首次招生，考点设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和汉口五市，^①而1931—1937年间，招生考点减少到上海、北平、广州和武昌四地。^②检索《申报》记载的上海其他各主要高校招生简章，除东吴法学院因文、理科在苏州，部分年份（如1935年）在上海和苏州两地同时招生外，圣约翰大学与大同大学等高校一般均只在上海本地招考新生。限于民国时期的交通状况、信息传播渠道等，考点设置在有限的大都市中，显然提升了远离大学和大都市青年的投考成本和难度。而若进入战争动荡时期，这种地理阻隔更难以逾越，外地生源更受限制。

其次，上海本地更为商业化的氛围和浓厚的消费文化形成的高成本，也可能进一步抑制了包括国立大学在内的上海各类大学的外地学生来源。表3数据已显示，或是“居大不易”的缘故，民国上海大学生的年均花费要高于外地不少。譬如，相对于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在上海教会大学中的学费是较低的，1929年起该校因经费困难，为“推进校务”将学费从每年80元递加至100元，^③其学费在上海教会学校中仍是较低的，但此时北平更为著名、办学实力更雄厚的燕京大学学费却只是80元。^④在上海民众看来，大学生的生活是资产阶级化的，是“西装革履，行坐车，吃包饭”的。^⑤有大学生撰文指出，在上海是必须穿西装的，因为从巡捕到各类服务人员都只对穿西装的高看一眼。没有西装，甚至无法跳舞、约女生。“吃包饭”是因为上海部分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没有食堂，学生只能在校门口饭店包伙。此外，学校门口还有零食摊、咖啡馆、饮冰室，这也是大学生饮食的一个大消耗。学生“只要有钱，就有寻开心的玩意儿”。^⑥1927年，沪江大学教授安德生调查发现，多数沪江大学学生外出时喜欢到中菜馆小酌一番，而且还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喜欢上西菜馆吃大菜，这个比例以及学生愿意买票听市政厅音乐会的比例，不比上海的外侨低。^⑦在此种风气下，有上海大学生认为，与北方大学比较，上海大学生间的学术空气是稀薄的，大部分学生是功利主义的。^⑧这种消费主义的校园文化尽管可能更多体现在私立大学，但上海生活成本高和私立高校多的现实还是对各地学生，尤其是广大农村学生的就学选择产生了影响。正如一北平大学生所指出的，相对于上海大学生的生活消费，北平生活是“低贱”的，因此农村学生比上海多了不少。^⑨

织安排等没有规定。（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乙编《教育法规》，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60—61页）此外，尽管在1938—1940年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短暂地推行过统一招生，但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地区高校并没有参加1938年的首次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统一招生。（国民政府教育部：《二十七年度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简章》，《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组织章程委员名单招生办法简则工作报告等文件》，编号：五—5836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在1939年参加了一次统一招生后，因对这批学生素质不满意，次年便退出了。（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史》第4卷（1937—1949），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抗日战争胜利后，部分国立大学，如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等开展过联合招生，但这只是少数大学联合组织并非教育部统一招考。

- ① 《本大学组织纪略》，《上海交通大学月刊》1922年第1期，第2页。
- ② 交大两广同学会：《南针》1931年第4期，第10—13页；1934年第6期，第68—71页；1935年第7期，第20—23页；1937年第9期，第38—42页。
- ③ 《沪江大学近况》，《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9年第5卷第4期，第114—115页。
- ④ 《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0年，第24页。
- ⑤ 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2页。
- ⑥ 远翔：《上海大学生生活素描》，《益世报》（天津）1935年2月9日，第4张。
- ⑦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第143页。
- ⑧ 朱修：《光华大学学生生活素描》，《学校生活》第126期，1935年12月20日，第15—19页。
- ⑨ 李若男：《北平大学生界底现状》，《研究与批判》1935年第1卷第4期，第85—88页。

最后,大同大学有超过86%的学生家庭位于上海,本地化程度极高,这可能主要与民国私立大学的经济状况和办学水平有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掀起了创办私立大学的热潮。191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修正大学令》规定“凡设一科者,亦可称大学”,这股热潮很快达到了顶点,^①上海教育体系中的私立大学数量也由此远胜于国立。^②但数量优势的背后却是私立大学经费有限,经济状况不佳的现实。开办初期的大同大学,“在物质上毫无凭藉,校舍是租赁的,校具是杂凑的,书籍仪器是少得可怜的”,教员甚至“教书办事不拿薪水”。^③1932年,教育部调查上海六所大学,其中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四所私立大学,不是“收支不能相抵”,就是“年有积欠”或“欠债颇多”,相较于教会沪江大学,其经费“均极感困难”。^④学、杂费收入通常是大同大学等私立大学最重要的经费来源,^⑤保持高收费和较大的生源群体,便是其维持生存的关键。因此,私立大学不仅“全赖学生缴费为收入之大宗者”,而且“收费之惊人”,“精明之明目与手段”,“较教会立者为尤甚”。^⑥尽管收费不菲,但私立大学的师资、设备以及社会认可度却往往不如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对外地学生的吸引力也自然有限。实际上,基于花费、办学实力等因素的考虑,民国大学生形成了“国立大学优于教会大学,教会大学优于私立大学”的择校模式。以1948年中央大学大一新生们写的“自传”为例,^⑦学生心目中最希望投考的大学是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一流国立大学。一些新生曾考取过如大同大学、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但在权衡了学校声望和学费负担等因素后,或肄业一年转考入中央大学,或干脆放弃当年入学机会,复习一年后再考入中央大学。^⑧再如大同大学创始人之一顾珊臣之子顾宁先,曾于1925—1934年间就读于大同大学。这样一位对大同大学既有感情也很了解的人直言不讳地认为,学生选择读大同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考不上国立大学。^⑨而为了竞争生源,私立大学如大同大学尽管只能在上海招考学生,但它会在招生季密集安排数次甚至十数次考试,以便学生“随到随考”,^⑩同时招生标准也低于国立大学,^⑪在提高入学经济门槛的同时降低智力门槛。本地有条件但进入国立大学、教会大学等名校无望家庭的子女,便成了私立大学的生源主体。

① 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35页。

② 除本文已指出的上海私立大学数量远胜于公立外,1948年上海市共有公私立中学218所,其中公立仅18所,私立达到了200所。(杭苇:《上海中等学校的发展过程》,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8),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35—146页)曾长期服务于上海教育界的谢鸣九则认为,抗战胜利后,上海私立大专学校、中学校、小学校、职业学校和实习学校已不下千所。(谢鸣九:《上海私立学校的奇闻丑事》,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9册《科教文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04—428页)

③ 《校史,1912—1951》,《大同大学年刊》(1951年),编号:Q241—1—606,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 《教部发表视察上海六大学报告》,《申报》1933年12月25日,第3张第12版。

⑤ 蒋宝麟:《学人社团、校董会与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治理机制——以上海大同大学为中心(1912—1949)》,《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⑥ 中国学生社编:《全国大学图鉴》,第8—9页。

⑦ 学生“自传”篇幅多在数百字到数千字之间,内容包括学生个人的家庭情况,特别是经济情况,入学前所有求学情况等,相对于学籍卡内容要丰富很多,但仅有少数学校个别年份有全面的“自传”留存。

⑧ 例如,经济系学生梁继宗、农经系学生张文林、法律系学生陈达士、陈世震以及化工系学生谢民城等都有类似经历,参见《中央大学1948年新生自传》,编号:648—3234—325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⑨ 顾宁先口述、黄婷整理:《回忆大同大学》,《史林》2004年增刊。

⑩ 李慧:《民国时期私立大同大学的办学理念与招考实践》,《教育与考试》2016年第3期。

⑪ 《私立大同大学1950年度暑期招生汇报》,编号:Q241—117,上海市档案馆藏。

三、来源中学

中学是大学生源的主要提供者，也是大学生社会来源结构形成的前因与关键，对来源中学信息的分析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民国上海大学生的结构特征。民国大学招生逐步规范，中学文凭成为报考的必备，查验中学文凭也成为招生时的重要环节，^① 上海 8 所大学学生中有近七成提供了毕业中学信息，其中六成中学位于上海，超过九成的大学生毕业于江浙沪地区的中学，与各校家庭地址的分布基本一致。

将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三校学生的籍贯、家庭地址和中学驻地三类地理信息列表比较（表 6），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出三校学生的结构性特征和开放程度。上海交通大学有一小部分学生虽然家庭地址不在上海，但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尽管只有一半略多的学生家庭地址在上海，但却有超过 85% 的学生毕业于上海本地中学，本地化特征大为加强。大同大学学生中来自于上海中学的比例与来自上海家庭的比例都超过 80%，是完全的本地化。这种情况在三所大学基本是持续的。只有上海交通大学可能因抗战胜利后接收外地学校学生，上海学校输送的学生比例有所下降，江浙和四川等中学毕业生增多，但上海学校仍是输送学生最多的，江浙沪相加，仍旧占据多数。因此，来源中学的分析说明，除了上海本地家庭子弟外，对非本地家庭的子弟来说，上海地区的中学教育资源亦是不可多得的。

表 6 大同大学、圣约翰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籍贯、家庭地址和来源中学地理分布（单位：%）

地区	大同大学			圣约翰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籍贯	家庭地址	中学驻地	籍贯	家庭地址	中学驻地	籍贯	家庭地址	中学驻地
上海	8.72	86.1	84.44	5.45	52.18	85.79	3.18	40.06	43.84
江苏	42.87	7.2	8.82	31.62	12.07	6.43	41.23	25.79	17.44
浙江	32.4	1.76	2.15	29.47	5.07	1.03	22.59	9.01	6.02
长三角合计	83.99	95.06	95.41	66.54	69.32	93.25	67	74.86	67.3
安徽	2.8	0.35	0.57	3.83	0.93	0.4	4.6	2.14	1.43
福建	2.42	0.39	0.34	6.46	4.58	1.15	3.27	1.59	1.55
广东	5.6	0.14	0.4	16.26	2.75	0.9	5.92	2	3.55
江西	0.96	0.4	0.44	1.07	4.65	0.1	2.46	1.51	1.17
湖北	0.75	0.26	0.26	1.34	1.82	0.5	2.52	2.17	1.44
山东	0.76	0.5	0.32	1.27	1.45	0.2	1.47	1.68	0.84
四川	0.28	0.48	0.48	0.39	3.8	0	3.69	4.16	7.95
北平	0.19	0.22	0.31	0.1	2.79	0.7	0.31	1.38	2.48
港澳	0	0.67	0.57	0	2.15	1.71	0	0.7	0.78
天津	0.13	0.23	0.34	0.1	1.64	0.53	0.08	0.76	1.99
其他	2.12	1.3	0.56	2.64	4.12	0.56	8.68	7.05	9.52

注：上海交通大学不含重庆校区。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中，大同大学学生共 9050 名，其中 9041 名有籍贯记录，

① 相对灵活的按同等学力招考的规定自 1914 年教育部通令后就越来越严格，招录比例也逐步从不超过 10% 下降到 5%。关于民国以来对大学同等学力招考的制度变迁，参见李涛：《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研究》，西南大学博士论文，2014 年。

7718名有家庭地址记录,8410名有中学驻地记录;圣约翰大学学生共5325名,其中5137名有籍贯记录,4086名有家庭地址记录,4859名有中学驻地记录;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共9932名,其中8051名有籍贯记录,7101名有家庭地址记录,6477名有中学驻地记录。

表7进一步列出上海大学生所有来源中学中输送学生数量超过100名的42所中学名单及其地理位置。这42所中学为上海地区高校提供了超过一半的生源,其中只有6所不在上海,占14.3%。这6所中学中有5所位于江苏,1所位于浙江,都非常靠近上海。这些中学对上海大学生的来源结构影响巨大,而它们的地理分布则非常集中。

表7 向上海8校输送学生超过100名的中学名单

校名	数量	驻地	校名	数量	驻地
上海圣约翰中学	1470	上海	上海青年会中学	192	上海
上海中学	1248	上海	上海培成女子中学	183	上海
上海大同中学	1050	上海	杭州高级中学	167	杭州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868	上海	上海中国中学	161	上海
上海南洋中学	574	上海	上海圣玛利亚女中	157	上海
上海民立中学	471	上海	上海金科中学	155	上海
光华大学附属中学	459	上海	上海光夏中学	149	上海
上海沪江附中	426	上海	常州中学	148	常州
扬州中学	341	扬州	上海务本女子中学	139	上海
苏州中学	319	苏州	上海敬业中学	132	上海
上海允中女中	304	上海	上海民立女子中学	129	上海
上海清心女中	301	上海	上海启秀女子中学	128	上海
上海浦东中学	283	上海	上海晏摩氏女中	126	上海
上海复旦中学	252	上海	上海圣芳济中学	121	上海
上海育才中学	235	上海	上海明德女子中学	121	上海
上海清心中学	224	上海	上海晋元中学	111	上海
上海辅仁中学	220	上海	上海格致中学	108	上海
东吴大学第一中学	217	苏州	南通中学	105	南通
上海育英中学	209	上海	上海女子中学	105	上海
上海中西女中	201	上海	上海肇光中学	102	上海
东吴大学第二中学	193	上海	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	103	上海

注:上海以外的中学有很多曾在抗战时期避乱于上海,如苏州中学、扬州中学、常州中学和南通中学等,但此处为厘清上海大学生来源中学的地理分布,并没有将这些中学在上海时期的学生计算在内,而是做了单独处理。上海8校学生总数为36201人,其中填写来源中学的有24017人。输送学生数量超过100名的中学有42所,共输送12707名学生。

来源中学本地化倾向的背后至少暗含了民国中小学教育体系的两个特点:一是大学常设有“附属”或合作中小学,“系统内”的学生往往享有各类优先或免试录取的待遇;二是民国上海中小学教育水平领先全国,外埠学生亦可入读。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草创,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多有脱节,许多中学毕业生并不符合大学教育的要求,培养起来困难颇多,为此大学纷纷设置附属中、小学,或者与一些特定中学合作。例如,上海交通大学自南洋公学时期就曾办理附属中、小学,它们的学生可以从小学、中学一

路直升至本校大学。^①这使得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大都由小学肄业起，直至大学毕业止，依次递升，自成系统”，这样“既可免程度之不齐，又可保精神之团结，法自善也”。^②同济大学也规定本校附属高中、德文补习科的毕业生可直接升入大学，而其他高中毕业生等则需要考试及格后才能录取。^③这种做法显然提升了附属中学生升入大学的可能。而出于感情、便利和习惯等因素考虑，附属中学的学生如果不能考入优于本校大学的高校，也往往倾向于留在本校大学。1925年，清华初办大学部，由于学生不再直接、全部留美，吸引力大为降低，当年考中的学生中有27人未来报到。27人中有19人来自京、津、沪、宁的4所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认为他们都“转回而入其连属自校大学部”。^④因此，上海8所大学中学生样本量较多的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东吴大学法学院，其附属中学在表7中的排名都非常靠前。圣约翰中学排名第一，大同中学第三，南洋模范中学（上海交通大学附中）第四，东吴大学第一、第二中学相加排名第九。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附属中学也都出现在表7中，且排名靠前，向上海高校输送学生也较多。附属学校不仅在地理和管理上与主管大学成为一体，更由于“直升”、“保送”制度，在生源上也成为了一体。大学人才的选拔关口直接与中小学招生对接。

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为了保证学生质量和兼顾本教会传教人员子女的教育，除直接建立附属中学外，还会和一些英语教学水平较高的教会中学建立合作关系，保送优秀毕业生到圣约翰大学就读。1914—1949年间，圣约翰大学的合作中学有圣约翰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民立中学、圣彼得教区学校、马汉学校和圣玛利亚女中、中西女中等。其中圣玛利亚女中、中西女中的学生与圣约翰中学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新生班。^⑤而沪江大学曾允许苏州晏成、杭州惠兰、宁波浸会以及上海清心（美国北长老会）和监理会等17所男校和4所女校的毕业生只要有中学推荐书和毕业文凭，就可以不必考试而入学，其他中学毕业生则必须考试合格才可录取。^⑥这些举措，在导致上海大学生源多来自本地中学的同时，也促使不同类型的高校学生来源中学的性质结构有所区别。教会大学学生更多来自教会中学，国立大学学生更多来自国立中学等。

作为大都市，民国上海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也优于外埠，有一批管理严格、教学水平高的学校，且即便不是附属中学，不少沪上名校也常与各大学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能力将毕业生送入大学校门。19世纪20年代，上海中学的理化教学要求超过教育部颁行标准43.75%，数学教学超过56.25%，国文教学超过76.92%，外语教学更超过100%。^⑦表7中位居前列的浦东中学，素以重数理著名于沪上，非但“英、算较普通中学为高”，考绩标准也很严。学生“国

① 赵宪初：《南洋模范中学校史简述》，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8），第194—202页。
 ② 刘良湛：《停办中小学之回忆》，黄昌勇、陈华新编：《老交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另外，1927年清华大学校内讨论清华大学是否应办附中时，也有人提出“当时的大学新生的素质过于低，跟不上大学教学要求，清华办附中既是为自己准备大学人才，也是为全国办附中。”（少年：《从事实上论清华应设附中》，《清华周刊》1927年第422期，第473—476页）
 ③ 国立同济大学出版课编：《国立同济大学学则概览》，1934年，第1页。
 ④ 朱敏章：《大学部入学人数之研究》，《清华周刊》1925年第357期，第3—5页。
 ⑤ 汪统：《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8），第1—10页。但据《圣约翰大学年刊》（1921年，编号：Y8—1—256—27，上海市档案馆藏），扬州美汉中学、安庆圣保罗中学、宁波斐迪中学、泉州培元中学等四所外地著名教会中学也曾为其合作学校。
 ⑥ 王立诚：《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第49页。
 ⑦ 许敏：《上海通史》第10卷《民国文化》，第136页。

文、英文、数学三科中有一科不及格者”，平均分数虽能及格也得停止其升级。^① 1930年，据上海浦东中学考上清华大学的汪定回忆，在浦东中学要读美国大学一、二年级 Duff 物理学、微积分和 Smith 高等化学等课程，学生考大学“如探囊取物”。^② 黄炎培也说该校“毕业生应考交通大学，几乎人人被录取”。^③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学生在升预科前也需要学习高等代数、球面几何、化学和物理试验等高端课程，^④ 其内容“概以衔接本科为目的，故程度较普通一般中等学校为高”。^⑤ 1939年，上海交通大学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国立院校统一招生，这本可提升外地学生进入该校的机会，但其很快发现这些统一招生的部分新生跟不上教学要求，需开设暑假学校补习。次年，教育部批准上海各校自行招生，上海交通大学随即退出了统一招考。^⑥ 这也反映了上海教学水平之高及其与全国其他地区间的“疏离”。

上海高升学率的著名中学在成为晋阶大学通途的同时，既巩固了本地学生在大学招生中的竞争优势和大学校园中的比例，也成了稀缺性社会资源而逐渐被社会中上层所垄断。这些中学学额有限、学费不菲，其生源不仅本地化，且普遍来自商人、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社会群体家庭。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学膳宿费甚至比大学部贵几倍。^⑦ 表7中的上海清心中学，建校七十周年时在校生成中70%为商人子弟，教育、医生和法律工作者共约占10%，其他职业比例则极低。^⑧ 上海中西女中在其建校初便已申明学校面向的是“富贵豪门的女儿”，提供“高等普通教育，中英并重”。^⑨ 城市里的工人、农民子弟不仅没有条件进入这些贵族学校，甚至收费低廉的私塾也读不起。^⑩ 贵族化的学校和教育契合了商业化环境中大学的需要，一些中学的高升学率实际可能成为了城市社会中上层控制流动的工具。

余 论

从家长职业到地理分布，再到毕业中学，民国上海大学生群体同质化趋向愈发明显。概言之，商人与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在民国上海大学中具有明显优势，在数量众多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中更是垄断群体。上海大学生的籍贯虽以江浙两省为主，但主体却是上海居民，且大部分在上海读中学。社会中下层与纯粹的“外埠人”在上海的大学中并不常见。此外，近代上海地区高校还以更早和更大规模向女性开放、引领全国风气为典范。但学籍卡数据表明，社会性别方面依然存在开放的“外表”和封闭的“内在”。数据确实印证了上海大学对女性的开放，大学新

- ① 浦东中学历史教研组：《上海市浦东中学校史初稿（1907—1958）》，编号：B105—7—564—8，上海市档案馆藏。
- ② 汪定：《从中学毕业到考上大学》，《现代中学生》1930年第1卷第2期，第59—63页。
- ③ 黄炎培：《浦东中学校史纲要》，编号：B105—7—564—1，上海市档案馆藏。
- ④ 周浩泉：《回忆南洋公学十二年》，吴汉民主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化教育编》第17卷《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68—175页。
- ⑤ 刘良湛：《停办中小学之回忆》，黄昌勇、陈华新编：《老交大的故事》，第111页。
- ⑥ 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史》第4卷（1937—1949），第33页。
- ⑦ 蔡镇寰：《谈谈小学堂》，黄昌勇、陈华新编：《老交大的故事》，第94页。
- ⑧ 《清心两极中学七十周年纪念刊》（按：极或为级字之误），编号：U102—0—216—66，上海市档案馆藏。
- ⑨ 薛正：《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吴汉民主编：《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8），第173—187页。
- ⑩ 调查发现，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绝大部分农民、工人的子女依然无力接受任何教育，一些小资产者家庭子弟也只读得起条件非常有限的私塾。参见姚佐元：《南京城内农家之分析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一编）《乡村社会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3—279页。

生中女性比例总体呈波动式上升，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深入分析发现，这种开放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女性社会经济背景的精英化趋势极明显，甚至高于男性的精英化。近90%的上海地区女大学生来自商人、专业技术人员或公务人员家庭，而男大学生的相应比例为84%，且几乎没有上海女大学生来自农民家庭。从地理来源角度看，女性较男性更趋向于本地化，这种特征在上海地区高校中更明显。离家读书的经历可使女性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但上海女大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获得这种自由。然而，通过职业和婚姻，她们利用现代高等教育实现了精英身份的代际传承，^①也暗示着对于女性及其原生家庭而言，新的社会身份获得方式的形成。

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的起始地，上海是开放的机遇中心和现代精英的摇篮，现代职业随着逐渐繁荣的工商业兴起，投资者在这里办厂开铺，渴望新气象的教育者和文人来此开办学校、著书立作，“新女性”在此找到实现经济独立的就业机会。有学者认为，这些转变在加强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同时也大为加剧了阶层分化。^②正如教育是最重要的新机遇之一，学生通过大学教育得以步入新职业领域，成为引领近代化的精英。但这一新机遇的开放程度却是有限的。实际上，职业化或新式职业群体的出现改变了科举体系下“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选择，社会中上层的来源出现多元化倾向，但经济文化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分布以及如教育等重要资源在地域和城乡中的分布极不均衡等，也加剧了社会阶层间的分化，中上阶层出现“封闭”趋向，新的阶层固化或资源垄断迅速形成。

具体到民国上海地区高校学生来源，由于国民政府教育投入的匮乏和对教育资源掌控、布局能力的缺失，民国大学在经济上依赖城市资本主义经济与有产阶级，在地理分布上则主要集中于城市，这不仅导致教育体系中学校布局与教育水平的区域不平等和公私立学校的结构不平衡，更导致大学教育成本高昂，使得社会阶层间的经济不平等渗入到教育领域。同时，民国高校招考既缺乏科举体制下的“解额制”对学生地理来源的调控，亦不可能推行统招统考体制，使得招生缺乏统一的考试标准、内容以及考试组织和生源分配，无法以国家和制度手段保障学生来源结构的多样性，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并导致社会上升流动渠道的狭窄化。在民国“有本事、抱大志的人，必不可免地是进入城市，特别是进入省城，因为，只有在那里，才有最好的学堂和最好的发迹机会”，^③但现实却是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未曾集中于都市”，“学校在中国只成为政治上之一种装饰品，而未能有多大裨益于大多数民众。”^④因此，尽管上海地区高校招生在理论上是面向各地和各阶层的，但几乎只有具有较高资产支持和有限地区的家庭能够负担高昂学费，大学教育绝非普通人成功的阶梯。

民国上海地区大学生来源状况或教育精英的形成机制，还为更深入思考提供研究的起点和后续空间。中国近现代教育转变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较早关注的主要是工农等社会中下层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被边缘化，近年则较多注意到城乡关系，深入探讨了新旧教育体制转换过程

① “离家”包括赴异地和住校。虽然后者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远离原生家庭影响，但前者显然更能扩大女性自主生活的机会。(Zheng Wa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H. T. Zurndorfer, “Gender,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ew Woman’, the Experiences of Female Graduates in Republican China,” in M. Leutner and N. Spakowski, eds., *Women in China,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lin: LIT Verlag, 2005)

② 朱汉国：《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态势及其特征》，《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③ 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3页。

④ 雷宾南：《中国教育之新要求》，《教育杂志》1930年第22卷第4号，第1—3页。

中形成的城市与农村脱节问题。^① 但一方面，在关注中下阶层境况转变时忽略了对精英群体的研究，尤其对此前扎根农村的中国精英家族在此过程中的分化与变迁关注不够。依据上海的经验，晚清近代以来部分江南精英家族出现了由仕途转向工商业、从“谋官”转向“谋财”、从“绅士”转向“商人或专业技术人员”的现象，他们在自己进入城市的同时也把子女带入城市，接受新式教育，完成了家族的城市化与近代化。这一转化改变了过往通过科举走入仕途以及支持家乡办学以保持家族社会经济地位的模式，反映了阶层流动机制的改变和精英阶层因势调整社会分层策略的可能。对中国精英家族或有条件家庭来说，这种策略是开放或可选择的，不同家族甚至同一家族内部不同家庭的选择并不相同，不同地区和职业背景的家族对子女接受新教育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预示了传统精英家族群体内部的分化与变迁。社会精英作为“有组织的少数”，在社会变迁与演进中的作用非常突出，^② 因此，对这些选择的系统研究很可能蕴含着对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的新理解，有待学者们继续深入挖掘。

另一方面，尽管城乡关系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对城市之间，甚至同一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阶层分化问题却所知较少。实际上，上海虽然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奇迹和近代化的标兵，但这里既存在李欧梵笔下的“摩登”、繁华与现代，也存在卢汉超展示的“霓虹灯外”的落后与贫困。^③ 同时，上海既有经济文化上全方位开放，活力四射的一面，也有本研究揭示出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存在的“本地化”倾向。由此而论，民国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和国际化的样本，在成为“高峰”的同时，会不会也变成一座“孤峰”？民国上海在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很多方面或许还有很多新的空间和问题。

〔作者梁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93；任韵竹，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王雨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李中清，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

（责任编辑：武雪彬）

① 代表性研究如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等等。

②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③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关于两个著作的比较研究，参见杨华：《上海：摩登时代与霓虹灯外——两位美国华裔学者的上海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looked down on by civil officers. But in the Chinghua and Hongzhi reigns, there was a trend for eunuchs to “submit orders for official appointments” that made it possible to become an official without passing the examinations. Medical officers were among the main beneficiaries of this practice; many were able to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on their status and move into the civil service, a shift that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 between civil officials and medical officers. Although the medical officials thus promoted had been raised to higher positions, their powers were limited to medical administration. However, that did not prevent officials in the civil stream from treating these newly promoted medical professionals as heterodox. Limits on the ways one could become an official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and technical officials were hotly debated. Investigation of how medical officers were promoted and the debates surrounding this topic in the Chinghua and Hongzhi reigns can give u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edical officers’ selec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way their identity and image were shaped b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vanese Sugar Industr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Prewar East Asian Sugar Industry

Zhao Guozhuang(57)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saw great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East Asian sugar industry. The once dominant Chinese sugar industry broke up as Japan and British Hong Kong became the main centers of the sugar industry, while Europe, Java, Cuba and China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forming a new East Asian structure. The Javanese sugar industry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se changes; cheap raw sugar from Java entered the East Asian market in large quantities,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and British Hong Kong refined sugar industry and exacerbating competition among the main entities in the East Asian sugar market, and good strains of sugarcan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were introduced into East Asia, improving the varieties and increasing the acreage of sugarcan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then ruled by Japan. Responding to the huge demand for sugar, the Javanese sugar industry took the initiative in transforming its operations, so that its refined sugar poured into East Asian markets. The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ava an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sugar industries enables us to see the internal details of the changing position of these industries and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multiple face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prewar East Asia.

Some Thoughts on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Student Backgrounds in Republican Shanghai

Liang Chen, Ren Yunzhu, Wang Yuqian and Li Zhongqing(76)

As the most important window on to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Republican Shanghai had not only a commercial economy and a diversity of cultures, but also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ut of all Chinese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 many students reared in these institutions constituted an indispensable talent bas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so their group characteristics are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is era. Ou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background data on college students in university records assesses their place of origin, family background and the system they came from. Our findings show that they were relatively homogeneous in terms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wer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Theoretically, these public and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open to all of society across the country, but in fact their students tended to be from local families with cultural or financial advantages and to have come through local secondary schools with a myriad ties to

th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publican Shanghai throws a sidelight on the real situation of Republican higher education.

The Parish, the Turnpike Trust and the Reform of British Road Administration in the Six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ies Shen Qi(93)

Starting from the 16th century, the parish was the base-level organization of English road administr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specialization of road transport led to a transportation quandary.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parliamentary legislation tried to strengthen the parish system, but was unable to resolve its problems due to through-road externalities and funding bottlenecks. From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parliament authorized another road management body, the turnpike trust. These resolved the former system's contradiction between road users and those responsible for road upkeep, achieving effective road maintenance and supervision premised on freedom of passage and public ownership. The turnpike trust also expanded channels for funding road maintenance and helped achieve a balance of interests, providing an effective means of maintaining, constructing and improving heavily used roads. Road governance under parliamentary supervision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ocal governanc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hipping of Bulk Commodities on the Volga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Russia (1850-1913) Zhang Guangxiang(114)

Research on the Volga as a transport conduit must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transport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s well as the synthesizing effect of water transport in Russia's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to a modern society. Prior to the dominance of rail transport, the advantage of the Volga for shipping bulk commodities was reflected in terms of the flow of goods on the main stem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The shipping of grain, timber and other commodities maximized the commodity rate of raw materials, and the river's market scale effect can be seen from the water transport specialization index. The market formed by commodity circulation and the associated specialization encouraged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industries. These internal factors, together with shipbuilding improvements, constitut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cities along the waterway, with Astrakhan growing from a small fishing village to a regional urban center. The transport of bulk commodities along the Volga,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markets and industry growth from the late 19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onstitute new fields for research on the pre-Soviet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

Academic Review

“Leav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Behind”: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China's Social Mobility from the 7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Zhang Tianhong(137)

The circulation and mobility of elites with political power is the most noteworthy feature in the study of China's social mobility from the 7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focused first and foremost on elite circulation and mobility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cademic assessments of family influence on social mobility vary due to differences in unit selection, but the maintenance of a family's social status was ultimately determined by family members' examination results and their positions in the bureaucracy. The relationship